

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基于控制点和信任的证据

敖翔 陈轩 赵忠*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以控制点和信任两类典型的人格特征为代表，分析了中国家庭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父母人格特征对子女人格特征具有重要影响；周围环境中的普遍人格特征对子女的人格特征具有独立的影响；父母之间存在基于人格特征的正向选型婚配，并且增强了其在控制点人格特征上对子女的代际传递。研究结果证实了文化代际传递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还发现，对于不同类型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家庭特征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表明社会化机制在人格特征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于我们理解人格特征的形成，以及制定相关影响人格特征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代际传递 人格特征 选型婚配 控制点 信任

一 引言

代际传递是指父母的能力、特征、行为、观念、发展结果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而贫困代际传递是关于经济状况的代际传递。很多经济学文献研究了中国收入和教育代际流动性问题（Zhang & Eriksson, 2010; Gong et al., 2012; Golley & Kong, 2013; 罗楚亮、刘晓霞, 2018）。某种意义上，收入和教育是个人发展的结果，而目前关于收入和教育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从政策制定角度而言，理解哪些因素导致经济状况的代际传递，从根源上提高代际间经济状况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

* 敖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电子邮箱：bnuaoxiang@126.com；陈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电子邮箱：xchen11@ruc.edu.cn；赵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电子邮箱：mr.zhong.zhao@gmail.com。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 2017 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随着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个人的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对其教育水平和收入有重要影响,并且非认知技能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比认知技能更为重要(Heckman et al., 2006)。Bowles & Gintis (2002)指出,“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由一系列不同机制解释,包括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的遗传和文化传播等”。因此,收入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是认知技能和非认知技能在代际间的传递所导致的结果。

在一些研究中,非认知技能也被称为人格特征^①。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人格特征代际间传递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Eaves et al. (1999)在对美国家庭双胞胎的研究中发现,家庭内部成员的人格特征具有很强的遗传特征。基于德国家庭的数据,Anger (2011)研究了内控、外控和大五人格的代际传递,发现相关系数在0.19至0.27之间。Dohmen et al. (2012)发现,父母能够将自己的风险厌恶程度和信任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Gauly (2017)发现,耐心、冲动和互惠倾向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同样存在代际传递。后两项研究进一步发现,周边环境中的其他榜样也会影响子女人格特征,而父母的正向选型婚配(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提高了他们将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的能力。在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家庭的研究中,池丽萍(2013, 2014)基于小样本家庭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的信任水平与他们父母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卿石松(2018)发现,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与子代尤其是年轻子女的性别角色观念高度正相关。与国外相比,国内关于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且缺乏有关传递机制的研究。

本文聚焦两种典型的人格特征:控制点和信任。控制点反映了个体对其生活决定因素的一种看法,即个人生活是由外在因素还是自己行为决定的;信任指个体是否能够或者愿意相信和信赖他人或团体。已有学者就控制点和信任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进行了充分探讨。相关研究发现,控制点会对个人发展的很多重要行为和结果产生影响,包括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表现、健康习惯、储蓄行为等(Cobb-Clark, 2015; Cobb-Clark et al., 2014, 2016)。而信任会对社会交往领域中个人的合作意愿以及人际交往方式、个人的投资行为、社会网络的形成、家庭的创业决策等产生影响(Glaeser et al., 2000; Kosfeld et al., 2005; Ding et al., 2015; Kim & Aldrich, 2005; 周广肃等, 2015)。因此,父母有可能通过将控制点和信任的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进而影响子女的经济社会表现。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以控制点和信任作为人格特征代表,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① 一些研究用“非认知技能”来涵盖人格特征等心理因素,与“认知技能”形成直观对比(如Heckman et al., 2006)。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可能会造成混淆,因为几乎所有人类行为都包含认知,直接使用人格特征更合理(Borghans et al., 2008)。本文下面统一采用人格特征这一概念。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 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进行了详细考察。从父母人格特征对子女的垂直传递、当地环境中人格特征的横向传递、父母之间的正向选型婚配三个角度, 验证了文化代际传递理论在中国家庭的适用性。目前, 关于中国人格特征代际传递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 本文提供了文化代际传递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并且探索了家庭特征和家庭成员关系对人格特征传递的异质性影响, 弥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传递机制研究的不足。

二 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理论框架

传统经济学研究中通常把个人的人格特征禀赋作为一个“黑箱”。Bisin & Verdier (2000) 开创性地提出文化代际传递模型, 认为人格特征代际传递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人格特征受父母或其他榜样人格特征的影响。具体来说, 该模型包括三种传递因素。第一种发生在家庭内部, 父母根据自己的某些特征来塑造子女的特征, 被称为“垂直社会化”, 在这一过程中, 可能同时包括了父母关心子女效用的利他主义, 以及父母认为他们自己的人格特征对子女是最好的家长主义 (Doepke & Zilibotti, 2017)。第二种发生在家庭之外, 子女受周围环境中普遍人格特征的影响, 被称为“横向社会化”, 主要通过偏好渠道和期望渠道发挥社会互动效应 (Manski, 2000)。第三种是正向选型婚配, 指的是个人希望将自己的人格特征传递给自己的子女, 在婚姻市场上搜寻与自己人格特征相似的伴侣, 从而以最有效的方式将自己的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 这也被视为垂直社会化的一种策略。

我们用模型将上面三个因素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假设人群中有两种类型的人格特征, a, b 。假设子女出生后首先受到第一个因素, 即家庭社会化的影响, 父母努力使子女具有和他们类似的人格特征 $i, i \in \{a, b\}$, 子女获得人格特征 i 的概率是 τ^i , 而 τ^i 随着父母的努力程度而提高。当然这种努力是有成本的, 比如父母会放弃工作时间以更多地投入到对子女的教养活动中。这种社会化成本随着父母垂直社会化成功的概率而增加, 记为 $H(\beta\tau^i)$, β 是成本函数 H 的参数。如果垂直社会化没有成功, 即父母没有能够将他们的人格特征 i 传递给子女 (该概率是 $1 - \tau^i$), 子女会受第二个因素, 即周围人群 (朋友、同伴、老师等) 的影响。给定人群中有人格特征 i 的人所占比例为 q^i , 那么, 子女仍然可能有 q^i 的概率获得家庭中父母同样的人格特征 i 。但是子女也有可能以 $(1 - q^i)$ 的概率获得不同于父母人格特征 i 的人格特征 $j (j \neq i)$ 。因此, 家庭垂直社会化给人格特征 i 的家长带来的期望效用如式 (1) 所示。

$$W_1^i(q^i) = \max\{\tau^i + (1 - \tau^i)q^i\}V^i + (1 - \tau^i)(1 - q^i)V^j - H(\beta\tau^i), i, j \in \{a, b\} \quad (1)$$

式(1)中, V^i 表示具有人格特征*i*的父母从具有人格特征*i*的子女身上获得的效用, V^j 表示具有人格特征*i*的父母从具有人格特征*j*的子女身上获得的效用, 假定 $V^i > V^j$ ($i \neq j$)。

第三个因素假设, 人格特征同质的父母传递人格特征给子女的能力强于人格特征异质的父母。为了简化分析, 我们进一步假设只有父母拥有同样的人格特征时, 才有可能把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所以, 当配偶的人格特征不同时, 家庭社会化无法进行, 此时具有人格特征*i*的家长期望效用如式(2)所示。

$$W_2^i(q^i) = q^i V^i + (1 - q^i) V^j \quad (2)$$

当 $0 < q^i < 1$ 时, 可以证明, $W_1^i(q^i) > W_2^i(q^i)$ 。即从文化代际传递模型角度而言, 人格特征同质的父母从传递人格特征给子女中获得的效用大于人格特征异质的父母, 也就意味着存在正向选型婚配。本部分从理论上分析了文化代际传递模型所涉及的三个传递因素, 后文将运用计量模型对其进行实证检验。

三 数据及变量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持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该调查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 代表了中国 95% 的人口。我们用到的变量信息主要来自 CFPS 的成人问卷和家庭问卷。成人问卷除了涵盖基本人口信息、受教育水平等常见问题外, 还包括了有关人格特征的问题, 而通过家庭问卷我们可以将子女和父母一一匹配。其中, 父母和共同居住的子女是独立调查的, 这使得我们能够观察父母和子女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物理环境中的人格特征。

本研究主要使用 2010 年基线调查和 2012 年的追踪调查数据, 这两年的调查分别包括了我们关注的两类人格特征问题。由于控制点问题仅针对 16 岁及以上成年人, 同时考虑到人格特征在成年以后相对稳定, 为便于比较, 本文关注 16 岁及以上的成年子女和其父母人格特征的相关性。我们将样本限制在能同时观察到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的群体中^①,

① CFPS 2010 年基线调查只调查了“同灶吃饭”的家庭成员, 所以 2010 年样本中子女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2012 年追踪调查中有 200 位子女已经离开父母的家, 组建新的家庭, 两个家庭分别继续追踪。

最终得到 6365 位子女及其父母的人格特征信息^①。在后文中，我们把父母和他们的每个子女分别匹配。在最终样本中，子女平均年龄为 24.9 岁（标准差为 7.74），父亲平均年龄为 52.2 岁（标准差为 9.38），母亲平均年龄为 50.3 岁（标准差为 8.93）。

（二）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关注控制点和信任两类人格特征。控制点是人们对生活、工作及学习中行为结果的一种归因倾向。内控型个体通常将事件的结果归因于自身；外控型个体则认为，自己的行为结果由运气等外界因素决定（Rotter, 1966）。本文借鉴 Chen et al. (2018) 和 Gong et al. (2015) 的做法，基于 2010 年 CFPS 问卷中的 10 个问题构造了个人的控制点，具体内容见表 1。从表 1 可见，这 10 个问题调查的是受访者对成就影响因素的看法，受访者被要求按照李克特 5 点量表对这 10 个陈述进行认可评价，得分为从 1（“十分不同意”）到 5（“十分同意”）。关于控制点的前 6 个问题是外控性陈述（运气、家里关系、家庭社会地位、家庭财富、社会关系、天赋），问题 7~10 是内控性陈述（努力工作、努力程度、教育、聪明才干）^②。参照 Kling et al. (2007) 和 Chen et al. (2018)，我们构造了一个综合控制点来反映个人的归因倾向。具体来说，我们将 1~6 的外控性陈述评分反向处理，然后将 10 个问题的评分进行平均以构建受访者的控制点特征，得分越高意味着个体越倾向于内控。

CFPS 2012 年的问卷包含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的信任度量表。量表中设置了 6 个有关信任人格特征的问题，要求受访者分别评价其对父母、邻居、美国人、陌生人、干部和医生的信任程度（表 1），得分为从 0（完全不信任）到 10（非常信任）。类似于控制点的构造，借鉴 Booth et al. (2018) 的做法。我们对 6 个问题的评分进行平均以构建受访者的信任特征，得分越高意味着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

表 1 CFPS 问卷中测量控制点和信任的问题

人格特征维度	调查问题
	CFPS 2010 年：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观点）：1. 十分不同意 2. 不同意 3.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4. 同意 5. 十分同意

- ① 在 CFPS 2010 年调查中，我们得到 3136 位子女及其父母对控制点问题的回答信息。CFPS 2012 年调查有 4898 位子女及其父母对信任问题的完整回答信息。这两年样本并不完全一致，因为部分 2010 年受访的子女或者他们的父母没有在 2012 年完整回答信任的问题。同样，在 2012 年调查的部分样本中，我们也没有他们在 2010 年控制点的完整信息，其中有 69% 的受访者没有出现在 2010 年的成人问卷中。
- ② 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CFPS 2010 年全体受访者的控制点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得到两个特征值显著大于 1 的因子。根据各个变量的载荷，两个因子分别代表内控和外控。

续表

人格特征维度	调查问题
控制点	1.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运气。
	2.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或他/她的家里有关系。
	3. 社会地位高的家庭, 子女的成就也会大; 社会地位低的家庭, 子女的成就也会小。
	4. 富人家的子女, 成就也会大; 穷人家的子女, 成就也会小。
	5. 在当今社会, 有社会关系比个人有能力更重要。
	6.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天赋。
	7. 在当今社会, 努力工作能得到回报。
	8.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努力程度。
	9.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 获得很大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
	10. 在当今社会, 聪明才干能得到回报。
CFPS 2012 年: 对以下这几类人的信任程度打分(0~10), 0 分代表非常不信任, 10 分代表非常信任	
信任	1. 对父母的信任度
	2. 对邻居的信任度
	3. 对美国人的信任度
	4. 对陌生人的信任度
	5. 对干部的信任度
	6. 对医生的信任度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问卷整理得到。

图 1 展示了父母的综合控制点和信任特征的分布情况。父母的人格特征均具有变异性, 能够用来识别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影响。与母亲相比, 父亲的内控倾向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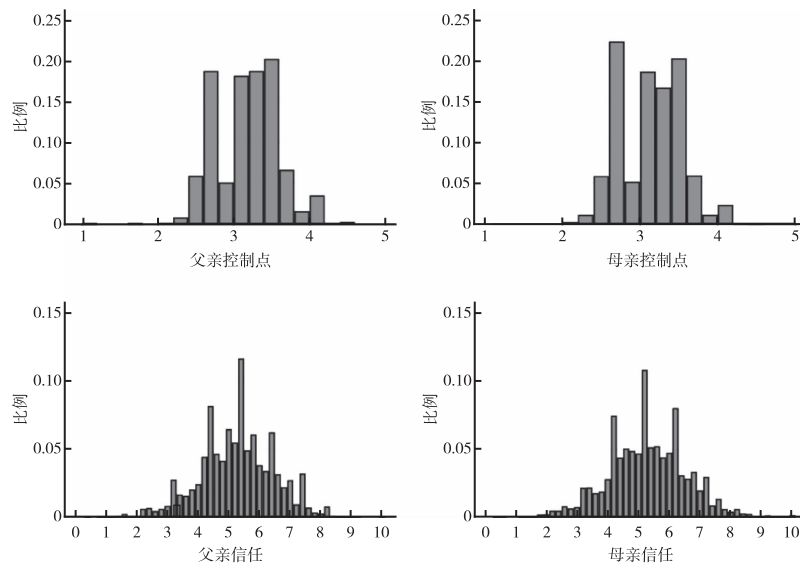


图 1 父母人格特征的分布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任程度都略高一些。在后文的分析过程中，为方便比较回归系数，我们基于子女和父母双方都完整回答了相应人格特征所有问题的样本，分别对子女、父亲和母亲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标准化。

此外，在对控制点和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发现年龄、身高、城乡、婚姻状况、当前户口及12岁时户口、民族、教育程度、是否党员、身体健康等其他一些变量与控制点和信任显著相关^①。这些结果表明，我们在随后分析中需要控制这些变量，以考察在控制影响人格特征的其他因素后，父母和子女的人格特征是否相似。

四 人格特征的代际相关性

（一）控制点和信任的代际相关性

我们首先用图示方式展示原始数据中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的关系。图2中的每个点显示了给定父亲或母亲人格特征时，子女对应人格特征的均值。图2中的加权回归线以每个点所对应子女的观察数为权重，回归线的正斜率初步表明，子女与父母的人格特征呈正相关关系。

表2为控制点和信任代际关系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被解释变量是子女的人格特征，关键解释变量是父亲和母亲各自的人格特征。为了研究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我们首先用子女的人格特征对他们各自父亲和母亲的人格特征进行回归。然后考虑到子女和父母其他个人特征的相似性，我们加入了影响人格特征的其他特征变量来控制这些特征，进而考察子女和父母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依然成立。

表2的第(1)列至第(3)列和第(4)列至第(6)列分别给出了控制点和信任代际传递的回归结果。表2第(1)列和第(4)列分别显示，随着父亲和母亲内控和信任程度的提高，子女的内控和信任程度也将提高。母亲和父亲的系数都是高度显著，并且影响程度相当大，这表明，子女的人格特征与父母双方的人格特征密切相关^②。表2第(2)列和第(5)列加入了性别、年龄和身高等外生变量考察控制了个人特征的相似性后，父母和子女的人格特征是否仍相关。如果以上个人特征不能解释人格特征代际

① 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FPS全样本。

② 我们也估计了只包括父亲或母亲一方人格特征的回归，父亲或母亲人格特征的系数比同时包括父亲和母亲时大了约40%。这表明，为了能够识别父亲和母亲人格特征的不同影响，在回归中同时包括父亲和母亲的人格特征是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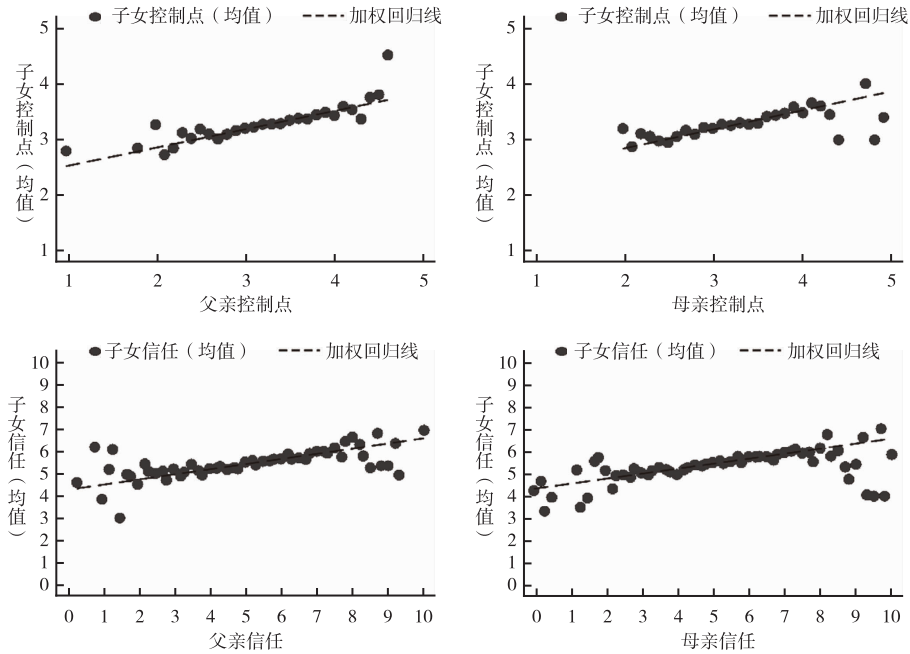


图 2 子女人格特征与父母人格特征的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之间的相关性，那就表明，父母和他们子女在人格特征上存在更直接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父母和子女的个人外生变量后，子女与父母人格特征之间的正向关系与表 2 第 (1) 列和第 (4) 列基本相同。与其他外生变量相比，父母人格特征的系数更大。我们同时发现，儿子的内控倾向和信任程度高于女儿，身高低和年龄小的子女的内控倾向和信任程度更低。

表 2 子女人格特征和父母人格特征的关系

	子女控制点			子女信任		
	(1)	(2)	(3)	(4)	(5)	(6)
父亲控制点	0.196 *** (0.020)	0.188 *** (0.020)	0.176 *** (0.020)			
母亲控制点	0.199 *** (0.020)	0.182 *** (0.019)	0.164 *** (0.019)			
父亲信任				0.159 *** (0.015)	0.158 *** (0.015)	0.146 *** (0.016)
母亲信任				0.152 *** (0.016)	0.160 *** (0.016)	0.158 *** (0.017)

续表

	子女控制点			子女信任		
	(1)	(2)	(3)	(4)	(5)	(6)
子女性别		0.168 *** (0.052)	0.089 (0.054)		0.066 (0.041)	0.123 *** (0.045)
子女年龄		-0.022 *** (0.005)	-0.024 *** (0.005)		-0.016 *** (0.004)	-0.003 (0.005)
子女身高		-0.017 *** (0.004)	-0.015 *** (0.004)		-0.003 (0.003)	-0.006 ** (0.003)
母亲年龄		0.005 (0.006)	0.006 (0.007)		-0.001 (0.005)	-0.004 (0.005)
父亲年龄		-0.007 (0.006)	-0.007 (0.006)		0.004 (0.005)	0.005 (0.005)
母亲身高		0.001 (0.004)	-0.001 (0.004)		0.002 (0.003)	0.001 (0.003)
父亲身高		0.006 * (0.003)	0.007 **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其他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数	3136	3127	3073	4898	4852	4409
R ²	0.107	0.146	0.191	0.063	0.074	0.121

注：第（1）列至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的控制点；第（4）列至第（6）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的信任；其中，子女和父母的人格特征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表中所有列的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第（1）列至第（3）列、第（4）列至第（6）列的解释变量信息分别来自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的调查结果；对于不随时间变化的解释变量，包括性别、民族、12 岁时户口状况等则以 2010 年调查为主，2012 年新增样本采用 2012 年信息；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在表 2 第（3）列和第（6）列，我们进一步加入了可能影响子女人格特征的个体及家庭的其他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城乡分类变量、子女是否已婚、父母和子女年收入总额，对父母和子女分别控制了当前是否农业户口、民族、12 岁时候是否农业户口、是否有宗教信仰、受教育年限、是否为党员、自评健康状况等。此外，我们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就人格特征而言，一些控制变量（如受教育程度、收入）可能是内生的，因此，不宜从因果效应角度解释这些变量的系数。当我们增加以上一系列控制变量时，父亲和母亲的人格特征的系数与前两列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这意味着，控制了两代人的各种个人特征和环境因素的相似性之后，子女与父母的人格特征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表 2 的结果表明，父母和子女在控制点和信任的人格特征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为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提供了证据。

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与以往研究关注的收入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在数量级上大致相当。例如，以往研究中估计出来的中国代际收入相关性大约为 0.45，受教育程度的代

际相关性约为 0.19 ~ 0.28 (Zhang & Eriksson, 2010; Golley & Kong, 2013)。而我们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相似性的情况下,同时提高父母控制点或信任的一个标准差会提高子女控制点或信任约 0.3 个标准差。因此,在研究代际传递问题中需要关注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影响。

(二) 控制点和信任具体维度的代际相关性

由于控制点和信任都是用具体维度问题构造的综合变量,我们进一步考察在两类人格特征的不同维度下,代际相关性是否稳健。表 3 中每列用一个不同的问题来衡量父母和子女对影响结果因素的认识。控制变量与表 2 中第 (3) 列相同。表 3 第 (1) 列至第 (4) 列报告了构成内控的 4 个维度的估计系数,分别询问了个人关于努力工作、努力程度、受教育程度和聪明才干对结果影响的认识;第 (5) 列至第 (10) 列报告了构成外控的 6 个维度的估计系数,分别询问了个人关于运气、家里关系、家庭社会地位、家庭财富、社会关系和天赋对结果影响的认识。从表 3 可以看出,构成控制点的每个具体维度在代际之间都表现出稳健的相关性。在表 4 中我们分别使用了对 6 种人群的信任人格特征进行回归,结果表明,父母对不同人群信任的反应差异在子女身上也能观察到。因此,子女不仅在综合人格特征上与父母相似,而且在人格特征具体维度上也会趋向于其父母。这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因为不同维度测度的是相同的潜在人格特征倾向,所以在更细的维度上也可以观察到代际相关性;另一种解释是,不同维度反映了人格特征的不同方面,这些方面在不同情境下是有差异的,对于这些具体维度中的每一项都存在明显的代际相关性。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解释,对综合人格特征及其具体维度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表明子女和父母的人格特征存在明显的代际传递。

表 3 子女控制点和父母控制点具体维度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内控细项				外控细项					
	努力工作	努力程度	受教育程度	聪明才干	运气	家里关系	家庭社会地位	家庭财富	社会关系	天赋
	(1)	(2)	(3)	(4)	(5)	(6)	(7)	(8)	(9)	(10)
父亲控制点 (对应细项)	0.110 *** (0.022)	0.107 *** (0.022)	0.111 *** (0.021)	0.106 *** (0.020)	0.164 *** (0.019)	0.117 *** (0.020)	0.171 *** (0.019)	0.136 *** (0.020)	0.105 *** (0.020)	0.139 *** (0.019)
母亲控制点 (对应细项)	0.123 *** (0.022)	0.098 *** (0.023)	0.116 *** (0.021)	0.128 *** (0.020)	0.137 *** (0.019)	0.146 *** (0.019)	0.136 *** (0.019)	0.185 *** (0.020)	0.121 *** (0.019)	0.102 *** (0.019)
观测数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3073
R ²	0.124	0.054	0.057	0.075	0.112	0.109	0.132	0.146	0.079	0.106

注:子女和父母控制点的各细项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2 中第 (3) 列一致;所有列的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FPS2010 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4 子女信任和父母信任具体维度的关系

被解释变量	信任细项					
	对父母信任	对邻居信任	对美国人信任	对陌生人信任	对干部信任	对医生信任
	(1)	(2)	(3)	(4)	(5)	(6)
父亲信任(对应细项)	0.094 *** (0.019)	0.160 *** (0.017)	0.153 *** (0.016)	0.163 *** (0.016)	0.111 *** (0.017)	0.097 *** (0.017)
母亲信任(对应细项)	0.112 *** (0.020)	0.133 *** (0.017)	0.132 *** (0.016)	0.139 *** (0.016)	0.163 *** (0.016)	0.123 *** (0.017)
观测数	4409	4409	4409	4409	4409	4409
R ²	0.099	0.102	0.156	0.117	0.104	0.073

注：子女和父母信任的各细项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他控制变量与表2中第(6)列一致；所有列的系数为OLS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CFPS2012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 关于稳健性的进一步讨论

有三个潜在因素可能会导致上面结果中所展现的子女和父母人格特征之间的正相关性。一是父母与子女在调查中可能相互配合回答问题导致他们的回答高度相关；二是子女对父母人格特征的反向传递影响；三是同一次调查中由于测量误差相关性导致人格特征代际的相关性。

对于第一个因素，我们认为在CFPS调查中，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首先，在调查过程中，访员被特别要求，成人问卷的填写须访员在场时由家庭成员本人回答。因此，调查设计中就排除了配合回答的可能性。其次，填写一份成人调查问卷需要回答19个模块超过200多个问题，即使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有一些交流，但是这种交流方式不太可能系统地影响本文所关注的人格特征对应的那部分问题。最后，由于CFPS访谈都是采用计算机辅助面访调查(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 CAPI)的方式，一次只有一个人可以在笔记本电脑上完成调查，这样就排除了父母和子女同时完成调查问卷的可能。因此，上面的结果不是由家庭成员之间的配合导致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尽管人格特征的主要传递途径最有可能的是父母传递给子女，但不排除子女也会影响父母。例如，子女对外界的不信任可能会改变父母对外界的信任态度，子女的行为也可能影响父母的人格特征(Ge et al., 1996)。由于CFPS是对调查时状况的测量，并没有对子女出生之前父母的人格特征进行测量，所以研究中并不能完全排除反向传递问题。但本文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人格特征的代际相关性不太可能由子女对父母的反向传递来解释。例如，根据控制点的调查问题9(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获

得很大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对教育程度的归因倾向上,父母与子女显著正相关。鉴于子女出生的时候,父母的教育程度多数情况下已经确定,在这个维度下的代际关系不太可能由控制点的反向传递驱动。其次,考虑到年龄较小的子女社会阅历较少,其人格特征反向影响父母的可能性小,而受父母影响的可能性更大。我们对年龄在 20 岁及以下的子女样本进行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子女反过来影响其父母人格特征的可能性。

第三,由于子女和父母的人格特征是在同一次调查中测量的,所以测量误差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是相关的,人格特征代际相关性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测量误差的相关性。我们通过分析某一年调查问卷中子女人格特征测量值与另一年调查问卷中父母人格特征测量值的相关性来解决这一问题。控制点的调查只在 CFPS 2010 年的问卷中,但是信任的调查在 CFPS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的问卷中都存在。因此,我们分别用 2014 年、2016 年的子女信任对 2012 年的父母信任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年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信任仍然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尽管与表 2 相比,父母信任的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较大(子女 2014 年或 2016 年信任与父母 2012 年信任的相关性在 0.2 左右)。该结果表明,即使关于子女和父母人格特征的测量误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上面结果所揭示的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正向相关性是稳健的。

五 地区人格特征的影响

在 Bisin & Verdier (2000) 的文化代际传递模型中,第二个因素假设除了父母之外,子女的人格特征可能会受到当地其他榜样的影响。本节我们将区县作为分析单元研究地区人格特征对子女人格特征的影响。

表 5 考察了子女所在地区的普遍人格特征是否对子女人格特征具有解释力。我们在控制了前一部分回归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子女所在区县的平均人格特征作为新的关键解释变量。为了获得该变量的准确度量,我们利用 CFPS 数据中所有完整回答人格特征相关问题的受访者计算地区人格特征的平均值。因此,用于计算地区平均值的样本比用于回归分析的样本要更大(控制点和信任样本分别为 28072 人和 30368 人),因为其包含了我们没有观察到其父母的个体。在计算地区平均值时,我们排除了子女所在家庭所有成员的人格特征。此外,我们也控制了区县的居民数量、年龄和性别结构,以排除这些特征导致地区平均人格特征与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相关的可能性。为了便于比较,表 5 第 (1) 列和第 (4) 列报告了表 2 中第 (2) 列和第 (5) 列的结果。表 5

第(2)列、第(3)列和第(5)列、第(6)列的回归中分别加入地区平均的控制点和信任。回归结果显示,子女所在地区的平均控制点和信任都与子女对应的人格特征正相关,且高度显著。这表明,控制了父母人格特征之后,子女人格特征亦受周围环境中普遍人格特征的影响。与不包括地区平均人格特征的模型相比,父母控制点或信任的系数略有下降,且仍然显著。由此看见,横向社会化机制在人格特征形成过程中能够发挥独立作用,没有和父母的垂直社会化冲突。

表5 地区人格特征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子女控制点			子女信任		
	(1)	(2)	(3)	(4)	(5)	(6)
父亲控制点	0.188 *** (0.020)	0.159 *** (0.020)	0.161 *** (0.020)			
母亲控制点	0.182 *** (0.019)	0.158 *** (0.019)	0.152 *** (0.019)			
地区平均控制点		0.127 *** (0.022)	0.122 *** (0.022)			
父亲信任				0.158 *** (0.015)	0.142 *** (0.015)	0.138 *** (0.016)
母亲信任				0.160 *** (0.016)	0.150 *** (0.016)	0.151 *** (0.017)
地区平均信任					0.072 *** (0.017)	0.064 *** (0.018)
子女性别	0.168 *** (0.052)	0.132 ** (0.052)	0.094 * (0.054)	0.066 (0.041)	0.068 (0.042)	0.127 *** (0.045)
子女年龄	-0.022 *** (0.005)	-0.022 *** (0.005)	-0.026 *** (0.005)	-0.016 *** (0.004)	-0.014 *** (0.004)	-0.002 (0.005)
子女身高	-0.017 *** (0.004)	-0.016 *** (0.004)	-0.015 *** (0.004)	-0.003 (0.0036)	-0.003 (0.003)	-0.006 ** (0.003)
母亲年龄	0.005 (0.006)	0.009 (0.006)	0.008 (0.007)	-0.001 (0.005)	-0.001 (0.005)	-0.004 (0.005)
父亲年龄	-0.007 (0.006)	-0.008 (0.006)	-0.008 (0.006)	0.004 (0.005)	0.003 (0.005)	0.005 (0.005)
母亲身高	0.001 (0.004)	0.000 (0.004)	0.000 (0.004)	0.002 (0.003)	0.002 (0.003)	0.001 (0.003)
父亲身高	0.006 * (0.003)	0.006 ** (0.003)	0.008 ** (0.003)	-0.003 (0.003)	-0.004 (0.003)	-0.003 (0.003)
其他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续表

被解释变量	子女控制点			子女信任		
	(1)	(2)	(3)	(4)	(5)	(6)
地区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数	3127	3127	3073	4852	4833	4390
R ²	0.146	0.185	0.201	0.074	0.093	0.126

注：第（1）列至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的控制点，第（4）列至第（6）列的被解释变量是子女的信任；地区平均控制点和信任基于 CFPS 对应年份中家庭所在区县的完整样本计算，在计算均值时排除了子女所在家庭的所有成员；所有人格特征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列的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其他控制变量与表 2 中第（3）列和（6）列一致；地区控制变量包括样本中地区居民数量、性别和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 5 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子女选择到与他们自己人格特征相似的地区生活的结果，而非人格特征的横向社会化机制。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我们仅使用住房产权属于父亲或母亲所有的样本进行了相同的回归，也就是假设这些样本中子女不太可能选择他们的居住地区。虽然父母亦可能会根据自己人格特征对地区进行选择，但是我们在回归中控制了父母的人格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样发现，地区普遍的人格特征对子女产生了正向而显著的影响。

可能仍然会有人质疑以上结果，认为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也可能是由于他们都受到居住地区普遍人格特征的影响。如果该假设成立，子女和父母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应该类似于子女与同一地区内任何其他个人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参照 Dohmen et al. (2012) 的做法，将子女与所在区县内其他家庭中的父母重新随机匹配，并检验这些“重组”家庭中人格特征的相关性是否与真实家庭中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相似。如果“重组”父母——子女的相关关系与真实家庭相比没有显著差异，就表明子女与父母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关系实际上源于他们居住在同一地区。图 3 分别呈现了随机生成的子女与父亲、子女与母亲之间控制点和信任相关关系分布的直方图。相关系数从重复 1000 次模拟中得到，垂直线表示 CFPS 数据中观察到的子女与其实际父母的控制点或信任的相关系数。结果表明，“重组”父母——子女人格特征的代际相关性显著小于真实家庭。因此，居住在同一个地区不是导致子女和父母人格特征之间正相关关系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子女和随机分配父母的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正的，这又进一步验证了地区在影响子女人格特征方面具有独立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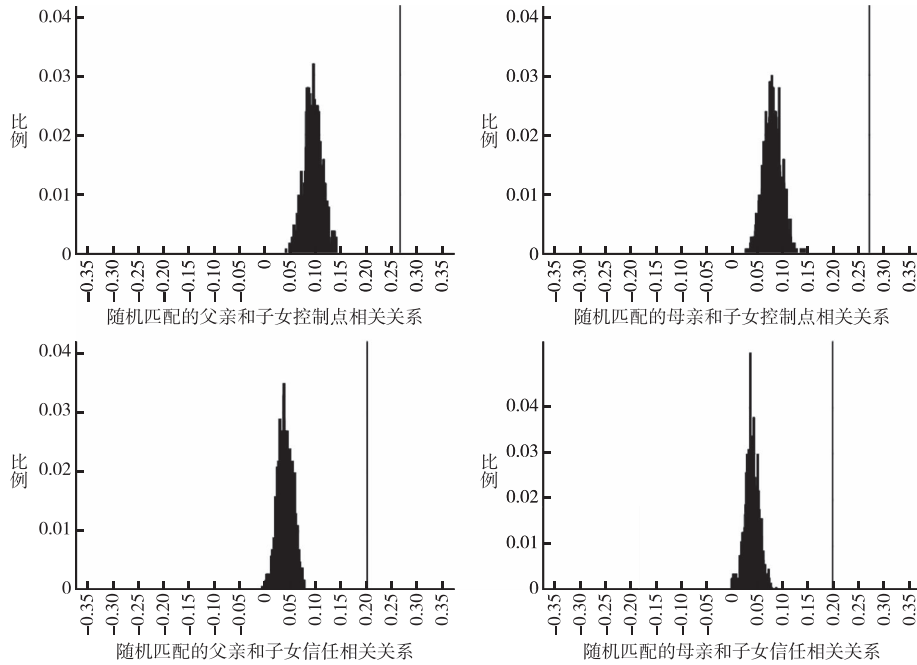


图3 子女和随机分配的来自同一地区的父母的人格特征相关性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六 父母的正向选型婚配

文化代际传递模型的第三个因素是正向选型婚配。根据 Bisin & Verdier (2000) 的模型，同质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社会化比异质父母更有效。前文回归结果显示，父亲和母亲都会影响其子女的人格特征，这也是正向选型婚配的一个重要前提。由于希望子女将来在人格特征与自己相近，个人在婚姻市场上会倾向于寻找与自己人格特征相似的伴侣。我们利用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调查的全样本以及可以获得子女人格特征信息的父母子样本，分析了已婚和未婚配偶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

表 6 给出了配偶间人格特征相关性的估计结果。表 6 第 (1) 列至第 (3) 列的样本包括所有具有完整人格特征信息的已婚或没有结婚但是同居的配偶，第 (4) 列至第 (6) 列则对应可以观测到子女人格特征的父母样本。我们用男性配偶的人格特征对女性配偶的人格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表 6 第 (2) 列和第 (5) 列中的回归包括年龄、身高等外生变量；第 (3) 列和第 (6) 列中包括了配偶双方的个人和环境特

征作为控制变量。表6中 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别是控制点和信任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女性配偶的人格特征与男性配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如果我们使用每个具体维度来衡量男性和女性配偶的人格特征,也会发现同样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上述结果表明,存在基于人格特征的正向选型婚配。

表6 男性与女性配偶人格特征的关系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男性配偶控制点					
	所有样本			样本中父母		
	(1)	(2)	(3)	(4)	(5)	(6)
女性配偶控制点	0.364 *** (0.011)	0.363 *** (0.011)	0.347 *** (0.011)	0.377 *** (0.019)	0.374 *** (0.020)	0.345 *** (0.020)
年龄、身高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数	8504	8474	8429	2664	2655	2644
R ²	0.132	0.132	0.161	0.142	0.143	0.188
女性配偶控制点	0.285 *** (0.011)	0.288 *** (0.011)	0.273 *** (0.011)	0.298 *** (0.018)	0.298 *** (0.018)	0.281 *** (0.018)
年龄、身高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其他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数	10297	10222	10173	3992	3958	3940
R ²	0.081	0.084	0.115	0.089	0.091	0.126

注:男性和女性的人格特征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列的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可能存在其他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配偶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导致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产生偏差。我们基于至少观察到其中一方的父母人格特征的所有配偶样本,使用配偶父母的人格特征作为配偶人格特征的工具变量,来进一步考察配偶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在回归中我们用配偶中没有观察到其父母一方的人格特征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另一方的人格特征回归(工具变量是其父母的人格特征)。我们假设,父母的人格特征不直接影响子女配偶的人格特征,只有通过其子女的人格特征(以及可能的子女其他特征,但这些特征已经在回归中进行控制)影响子女配偶。估计结果显示,第一阶段的 F 值大于 10,对于控制点和信任人格特征,配偶之间相关性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几乎是原来的 2 倍以上,这表明表 6 中配偶人格特征的相关系数可能被低估了。

为了排除婚后一起生活导致配偶间人格特征相似,而非由于人格特征导致的正向选型婚配的可能性,我们将样本限制在调查时近 3 年或 2 年内结婚的配偶。使用与表 6 中相同

的模型设定，我们发现配偶间的相关关系仍然显著为正，系数几乎与全部配偶样本一样大。

在 Bisin & Verdier (2000) 的模型中，正向选型婚配使得异质父母传递人格特征给子女的能力弱于同质父母，其背后原因是子女如果从异质父母那里接收到互相冲突的信号，会更有可能受到家庭外的影响，而拥有相似人格特征的父母不必与他们的配偶竞争应该根据哪一方的人格特征来影响子女，从而有更大的机会将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接下来我们通过考察父母之间的人格特征相似程度是否影响传递强度，来对此进行验证。

我们将样本分为父母相对同质（父母人格特征的绝对差异等于或低于 1 个标准差）和相对异质（绝对差异大于 1 个标准差）两个子样本分别回归^①。结果如表 7 第（1）列和第（2）列所示，相对同质的父母对子女控制点的影响比异质父母的影响更大，但是样本之间的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当我们对父母的人格特征取平均值来构造父母的综合影响时，如表 7 第（3）列和第（4）列所示，对于控制点而言，同质和异质父母之间的差异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p = 0.037$ ）^②，但在信任特征上，两组间父母的传递差异在统计上仍不显著。这表明，同质父母对子女控制点的人格特征影响强于相对异质的父母，而在信任人格特征的代际影响上并未表现出差异。

表 7 父母相似程度对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影响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子女控制点)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1)	(2)		(3)	(4)
父亲控制点	0.204 *** (0.042)	0.153 *** (0.027)	父母综合控制点	0.329 *** (0.021)	0.248 *** (0.033)
母亲控制点	0.194 *** (0.040)	0.147 *** (0.026)			
观测数	2072	1055		2072	1055
R ²	0.184	0.087		0.184	0.087

Panel B (被解释变量: 子女信任)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1)	(2)		(3)	(4)
父亲信任	0.156 *** (0.035)	0.147 *** (0.020)	父母综合信任	0.268 *** (0.019)	0.234 *** (0.025)
母亲信任	0.176 *** (0.035)	0.144 *** (0.021)			

① 我们使用的模型设定同表 2 中第（2）列和第（5）列。

② 当使用父母人格特征的平均值时，更高的显著性可能与均值会减少测量误差有关。

续表

Panel B(被解释变量:子女信任)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分组标准	父母相似程度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样本	同质父母	异质父母
	(1)	(2)		(3)	(4)
观测数	3227	1625		3227	1625
R ²	0.084	0.064		0.084	0.064

注: Panel A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控制点, Panel B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信任, 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的性别、子女和父母的年龄、身高; 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七 关于人格特征传递社会化机制的进一步证据

研究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 传递过程是纯粹基因遗传还是父母能够主动地影响子女的人格特征, 即关于“遗传 (nature) 与养育 (nurture)”的讨论。Harris (1995) 使用双胞胎数据, 基于将代际传递分解为遗传性与父母社会化的行为遗传学方法, 认为父母对儿童人格的影响几乎完全是遗传, 而社会化只通过同伴效应产生。Cunha & Heckman (2008) 指出, 这种分解依赖于一个过强的假设, 即遗传和环境的可分离性。与此相关, 使用同卵双胞胎来识别遗传影响的研究也存在争论。Fraga et al. (2005) 发现, 由于环境与基因的相互作用, 同卵双胞胎成年后并不完全相同。Duncan et al. (2005) 发现, 尽管母亲和子女在大多数人格特征上都表现出代际相关性, 但是家庭背景和教养方式对传递没有影响, 代际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主要受遗传因素影响。Zumbuehl et al. (2018) 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其研究发现, 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越投入, 其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的程度越高, 父母和子女在风险偏好和信任上的人格特征越相似。文化代际传递模型假设父母通过社会化的过程 (即养育) 传递他们的人格特征。本文的部分结果表明, 人格特征的传递过程和社会化有关,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遗传过程。例如, 人格特征在不同情境的具体维度下的代际传递, 与基因遗传无关的地区普遍人格特征的传递, 以及同质父母对子女控制点的影响强于异质父母, 均是社会化的表现。

下面我们从家庭特征和家庭关系两个方面提供更多关于人格特征传递过程社会化的证据。结合本文第二部分的理论模型, 由于父母对子女的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在家庭

内发生的，如果家庭中的某些因素减少了社会化的障碍，就可能增强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反之，如果增加了社会化的成本，就可能导致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的关系变弱。我们根据家庭特征和家庭关系下不同维度划分的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然后基于卡方统计量对同一维度下两组子样本方程间系数是否相等进行显著性检验。

表8显示了家庭特征的不同维度下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程度的差异^①。首先，年龄差距大的父母和子女之间可能会存在代沟，进而降低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的相关性。结果如表8所示，在父亲和子女年龄差距小于26岁（年龄差距中位数）的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控制点的影响显著大于年龄差距更大的家庭（ $p < 0.01$ ）^②。其次，随着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加，父母与每个子女一对一的时间投入减少了，这可能会降低社会化的强度。在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上可能存在质量和数量的权衡（Becker & Lewis, 1973）。质量指的是父母的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的程度。在理论方面，更多的子女对应于垂直社会化成本函数中一个更大的 β 参数。如表8所示，独生子女与母亲在控制点上的代际相关性显著大于有兄弟姐妹的子女（ $p < 0.1$ ）。第三，与子女数量相关的是子女的出生顺序，如表8所示，在控制点上，第一个出生的子女受影响大，晚出生的子女与母亲的相关性显著低于最先出生的子女（ $p = 0.05$ ）。这可能是因为在其他兄弟姐妹出生之前，第一胎的子女在家里受母亲影响的时间更长。最后，文化代际传递模型假设父母努力使子女有和他们类似的人格特征。Doepke & Zilibotti（2017）指出，在父母对子女的垂直社会化过程中，父母有家长主义的倾向，即父母认为他们自己的人格特征对子女是最好的。父母对子女施加影响的主观意愿越强，子女的人格特征可能会和他们越相似。我们用问卷中父母对“子女应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的认同程度来度量父母对子女施加影响的主观意愿^③。结果如表8所示，父母对“子女应达成父母的心愿”这一观点认同度越高，父母控制点和子女控制点的相关性越强，并且母亲的影响显著高出近10个百分点（ $p < 0.05$ ）。以上结果表明，家庭特征对控制点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传递会产生显著差异性的影响，但对信任代际传递影响的差异不显著。

① 我们使用的模型设定同表2中第（2）列和第（5）列。

② 在母亲与子女年龄差距的影响上，没有发现年龄差距对于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异质性影响。

③ CFPS 2014年调查中询问了父母对“子女应放弃个人的志向，达成父母的心愿”这一说法的认同态度，取值范围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我们将回答了这些问题的父母匹配到本文的分析样本中，按照父亲或母亲至少一方不认同（小于等于3）和父亲和母亲都认同（大于3）分组。

表8 社会化机制的证据：家庭特征

Panel A(被解释变量:子女控制点)								
分组标准	父母和子女年龄差距		子女是否独生子女		出生顺序		子女达成父母心愿	
样本	小于26岁	大于等于26岁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第一胎	非第一胎	认同度低	认同度高
父亲控制点	0.248 *** (0.028)	0.144 *** (0.027)	0.166 *** (0.036)	0.186 *** (0.023)	0.195 *** (0.047)	0.239 *** (0.042)	0.188 *** (0.029)	0.191 *** (0.032)
母亲控制点	0.163 *** (0.028)	0.199 *** (0.026)	0.226 *** (0.037)	0.152 *** (0.022)	0.231 *** (0.047)	0.110 ** (0.042)	0.126 *** (0.028)	0.221 *** (0.031)
观测数	1328	1799	900	2227	457	530	1448	1149
R ²	0.160	0.144	0.173	0.138	0.158	0.171	0.150	0.147

Panel B(被解释变量:子女信任)								
分组标准	父母和子女年龄差距		子女是否独生子女		出生顺序		子女达成父母心愿	
样本	小于26岁	大于等于26岁	独生子女	非独生子女	第一胎	非第一胎	认同度低	认同度高
父亲信任	0.163 *** (0.023)	0.155 *** (0.021)	0.159 *** (0.032)	0.157 *** (0.017)	0.132 *** (0.034)	0.176 *** (0.031)	0.164 *** (0.021)	0.149 *** (0.024)
母亲信任	0.158 *** (0.024)	0.162 *** (0.021)	0.166 *** (0.031)	0.158 *** (0.019)	0.209 *** (0.034)	0.183 *** (0.031)	0.159 *** (0.023)	0.142 *** (0.025)
观测数	2037	2815	1182	3670	891	1069	2446	1966
R ²	0.075	0.077	0.078	0.074	0.082	0.100	0.081	0.062

注：Panel A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控制点，Panel B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信任，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的性别、子女和父母的年龄、身高；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主要变量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子女达成父母心愿”变量根据 CFPS 2014 年数据计算得到。

表9 显示了家庭关系的不同维度下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程度的差异。首先是父母的生活满意度^①。文化代际传递模型假设，父母对子女的传递中包含利他主义倾向，父母可能会试图阻止子女得到对父母不利的人格特征。而当父母的生活满意度不高时，子女也可能不太愿意接受父母的人格特征。结果如表9 所示，当父母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时，父亲对子女控制点的影响更大 ($p < 0.1$)，而母亲对子女信任的影响更大 ($p < 0.1$)。其次，父母对子女社会化的能力也取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的亲疏。对于

① 生活满意度用问题“您对自家生活的满意程度”来测量。受访者被要求按照李克特5点量表法对自家生活情况打分，取值范围从1（很不满意）到5（非常满意）。当父母的生活满意度高于样本中所有父母的平均满意度时，在表9 中被视为“高”，否则为“低”。

数据中的部分子样本，我们有子女与父母亲疏关系的信息^①。如表 9 所示，在控制点和信任方面，子女和父母关系亲近的家庭与子女和父母关系一般的家庭比，母亲和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大将近 1 倍，并且在统计上显著 ($p < 0.01$)。在子女和父母关系一般的家庭中，母亲和子女人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都不显著，但是父亲却依然显著，这表明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主要会影响母亲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最后，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也可能会影响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传递，我们从家庭内性别关系和长幼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来考察^②。结果发现，家庭中长幼关系和性别关系对控制点的传递影响不显著，但是在信任传递上存在显著差异。从家庭长幼关系角度看，长幼关系对父母和子女信任的传递存在差异。在长幼平等家庭中父亲的影响高出长幼关系权威家庭中父亲的影响近 7 个百分点 ($p < 0.1$)；相反，在长幼权威家庭中母亲的影响显著高于长幼平等家庭母亲的影响 ($p < 0.05$)。这可能反映了父亲和母亲在传递人格特征给子女的方式上存在差异，父亲跟子女关系越是平等越有利于父亲信任的传递，而母亲信任的传递在一定的权威下影响会更大。性别平等主要体现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上，从家庭性别关系角度看，性别平等的家庭中父亲对子女的信任传递显著高于性别不平等的家庭 ($p < 0.05$)。这表明，男女平等的家庭环境有利于父亲信任的传递，但母亲的影响在两组家庭中没有显著差异。

表 9 社会化机制的证据：家庭关系

Panel A(被解释变量：子女控制点)								
分组标准 样本	家庭生活满意度		子女与父母关系		家庭中长幼关系		家庭中性别关系	
	满意度低	满意度高	一般及以下	亲近及以上	权威	平等	权威	平等
父亲控制点	0.145 *** (0.034)	0.214 *** (0.026)	0.284 *** (0.061)	0.154 *** (0.026)	0.212 *** (0.039)	0.205 *** (0.024)	0.211 *** (0.040)	0.192 *** (0.024)
母亲控制点	0.164 *** (0.033)	0.173 *** (0.026)	0.098 (0.063)	0.190 *** (0.025)	0.144 *** (0.040)	0.194 *** (0.023)	0.144 *** (0.040)	0.202 *** (0.023)

- ①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的调查分别对 60 岁以上的受访者询问了他们和子女的关系，2016 年的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和父母的关系，我们将三次调查的数据合并得到尽可能完整的父母子女关系样本。如果一个受访者多次出现，采用第一次回答的信息。在 CFPS 调查中，父母与子女关系分为很不亲近、不大亲近、一般、亲近和很亲近 5 个等级（取值从 1 到 5）。我们将子女和父亲、母亲的关系取均值，按照和父母平均关系在亲近或以上（亲近组）和亲近以下（一般组）分组进行子女人格特征对父母人格特征的回归。
- ② CFPS 数据包含访员对受访家庭的评价，我们采用访员评价受访家庭“长幼间的关系”和“性别间的关系”（从 1 到 7 表示从权威到平等）来衡量家庭中长幼之间或者男女性别平等的程度，将小于或等于 4 视为权威，大于 4 视为关系平等。

续表

Panel A(被解释变量:子女控制点)								
分组标准	家庭生活满意度		子女与父母关系		家庭中长幼关系		家庭中性别关系	
	满意度低	满意度高	一般及以下	亲近及以上	权威	平等	权威	平等
样本								
观测数	1221	1595	328	1881	662	2136	722	2144
R ²	0.122	0.161	0.138	0.146	0.172	0.155	0.148	0.164
Panel B(被解释变量:子女信任)								
分组标准	家庭生活满意度		子女与父母关系		家庭中长幼关系		家庭中性别关系	
	满意度低	满意度高	一般及以下	亲近及以上	权威	平等	权威	平等
父亲信任	0.126 *** (0.024)	0.171 *** (0.020)	0.131 *** (0.043)	0.149 *** (0.019)	0.113 *** (0.034)	0.179 *** (0.019)	0.105 *** (0.033)	0.178 *** (0.019)
母亲信任	0.122 *** (0.025)	0.176 *** (0.021)	0.046 (0.045)	0.173 *** (0.019)	0.211 *** (0.031)	0.140 *** (0.021)	0.188 *** (0.032)	0.152 *** (0.020)
观测数	2126	2726	549	3143	1102	3051	1149	3132
R ²	0.048	0.090	0.034	0.077	0.089	0.074	0.070	0.081

注: Panel A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控制点, Panel B 中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分别为子女和父母的信任, 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子女的性别、子女和父母的年龄、身高; 系数为 OLS 的估计结果; 括号内为家庭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置信水平显著。

资料来源: 主要变量根据 CFPS 2010 年和 2012 年数据计算得到, “子女与父母关系” 变量根据 CFPS 2010 年、2012 年和 2016 年数据计算得到。

综合表 8 和表 9, 我们发现社会化过程取决于家庭特征和家庭关系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反映归因倾向的控制点传递更多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 而信任主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其传递主要受家庭关系的影响。这表明, 控制点和信任的社会化过程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①。此外, 以上结果也表明子女的人格特征具有可塑性, 家庭环境会影响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

八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 基于控制点和信任两类典型人格特征, 研究了人格特征在家庭中的代际传递现象。研究结果支持了文化代际传递模型在中国家庭的适用性: 父母通过垂直社会化将自己的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 居住地区的普遍人格特征对子女人格特征的形成有独立影响; 父母在控制点和信任两类人格特征上

^① 我们也考察了特征角色模型假说是否成立, 即是否母亲对女儿影响更大, 而父亲对儿子影响更大。但在根据子女性别的分组回归中, 没有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都存在正向选型婚配，同质父母可以更有效地将控制点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本文亦从家庭特征和家庭关系的不同维度考察了控制点和信任的代际传递机制，发现家庭特征差异主要影响控制点的传递，而信任传递主要受家庭关系的影响。本文为中国家庭人格特征代际传递和社会化过程提供了经验证据，有助于打开人格特征形成来源的“黑箱”。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人格特征的度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从而可能低估父母和子女之间人格特征的相关性。Grönqvist et al. (2017) 利用工具变量方法纠正了父母人格特征的测量误差，发现以往研究中的人格特征代际相关性的估计存在向下的偏差^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估计结果可以视为父母对子女人格特征影响的下界。其次，人格特征的稳定性可能会影响估计的结果，如果人格特征高度依赖于具体情境，那么父母对子女垂直社会化的影响就可能更小。一般认为同一个体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如儿童、成年和老年阶段其人格特征可能发生变化，但具体到某一年龄段内，人格特征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具体到本文关注的控制点和信任，Cobb-Clark & Schurer (2012, 2013) 研究表明，控制点和信任在中短期内变化比较小，在时间上的总体分布是稳定的。这表明，个人存在某种潜在稳定水平的控制点和信任。为了更好地处理上述问题，需要在足够长的时间范围内对父母和子女人格特征的若干次测量数据，甚至需要子女出生之前的父母人格特征测量数据。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关于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研究对于更全面地理解个人的社会经济结果（如收入或教育）具有重要意义^②。尽管许多因素在微观层面上发挥作用（如直接转移资源），进而影响代际之间的社会经济结果，但人格特征的传递提供了另外的渠道。父母的人格特征传递给子女，或者周边环境影响子女的人格特征，都将影响到子女的行为表现，进而对子女的社会经济结果产生影响，导致代际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传递。例如，一个经济困难的家庭，如果父母有不良的人格特征并传递给子女，或者周边环境对子女的人格特征产生不利影响，那么子女在教育或经济上取得成功的机会也会减少，容易

① 他们用父亲13岁时候的测量以及叔叔在征兵时候的测量作为父亲人格特征的工具变量，用舅舅的测量来估算母亲的人格特征，这对数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本文数据中还无法实现。

② 遵照 Dohmen et al. (2012) 的方法，我们测算了父母控制点和信任传递与子女经济结果的相关系数，发现父母控制点同时提高一个标准差和子女选择自雇佣的概率增加0.25%、受教育程度增加1.1个月显著相关；父母信任同时提高一个标准差和子女选择自雇佣的概率增加0.28%、受教育程度增加0.8个月显著相关。结果都在1%的置信水平显著，影响程度和 Dohmen et al. (2012) 的估计接近，具体计算过程可向作者索取。但是要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数据支持。

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本文的结果表明,子女的人格特征受父母和周边环境的社会化影响,具有可塑性。从推进社会平等政策的角度而言,在孩子人格特征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政策干预来提高孩子的非认知技能,对于弱势家庭孩子的成长发展有重要意义(Heckman et al., 2006)。例如,对父母养育方式进行指导、改善孩子成长的周边环境。

影响个人发展的人格特征还有很多,而父母人格特征的代际传递是其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进一步考察其他人格特征代际传递的渠道、性质和程度,以探究人格特征传递对子女社会经济结果的全面影响。

参考文献:

- 池丽萍(2013),《信任:父母的代内相似和亲子的代际传递》,《心理学报》第3期,第336-341页。
- 池丽萍(2014),《青少年家庭中信任的代际传递:基于议价博弈的调查》,《心理与行为研究》第4期,第508-512页。
- 罗楚亮、刘晓霞(2018),《教育扩张与教育的代际流动性》,《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第121-140页。
- 卿石松(2018),《中国性别角色观念代际传递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第80-91页。
- 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2015),《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管理世界》第12期,第121-129页。
- Anger, Silke (2011).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During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5749.
- Becker, Gary & Harold Lewis (1973).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2), Part 2, S279 - S288.
- Bisin, Alberto & Thierry Verdier (2000).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rri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Trai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 955 - 988.
- Booth, Alison, Xin Meng, Elliott Fan & Dandan Zhang (2018). The Intergenerational Behavioural Consequences of a Socio-Political Upheaval.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1991.
- Borghans, Lex, Angela Duckworth, James Heckman & Bas ter Weel (2008). The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Traits.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4), 972 - 1059.

- Bowles, Samuel & Herbert Gintis (2002). The Inheritance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6 (3), 3 – 30.
- Chen, Yvonne, Yi Lu & Huihua Xie (2018). Education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aper*, No. 18 – 05.
- Cobb-Clark, Deborah & Stefanie Schurer (2012). The Stability of Big-Five Personality Traits. *Economics Letters*, 115 (1), 11 – 15.
- Cobb-Clark, Deborah & Stefanie Schurer (2013). Two Economists' Musings on the Stability of Locus of Control. *The Economic Journal*, 123 (570), 358 – 400.
- Cobb-Clark, Deborah, Sonja Kassenboehmer & Stefanie Schurer (2014). Healthy Habi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et, Exercise, and Locus of Contro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98, 1 – 28.
- Cobb-Clark, Deborah (2015).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Labor Market. *IZA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4 (3), 1 – 19.
- Cobb-Clark, Deborah, Sonja Kassenboehmer & Mathias Sinning (2016). Locus of Control and Saving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73, 113 – 130.
- Cunha, Flavio & James Heckman (2008). Formulating, Identifying and Estimating the Technology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Skill Formation.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4), 738 – 782.
- Ding, Zhujun, Kevin Au & Flora Chiang (2015). Social Trust and Angel Investors' Decisions: 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Nation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30 (2), 307 – 321.
- Doepke, Matthias & Fabrizio Zilibotti (2017). Parenting with Style: Altruism and Paternalism in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Transmission. *Econometrica*, 85 (5), 1331 – 1371.
- Dohmen, Thomas, Armin Falk, David Huffman & Uwe Sunde (2012).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Risk and Trust Attitud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 (2), 645 – 677.
- Duncan, Greg, Ariel Kalil, Susan Mayer, Robin Tepper & Monique Payne (2005). The Apple Does no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In Bowles Samuel, Herbert Gintis & Melissa Osborne (eds.), *Unequal Chances: Family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Succ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3 – 79.
- Eaves, Lindon, Andrew Heath, Nicholas Martin, Hermine Maes, Michael Neale, Kenneth Kendler, Katherine Kirk & Linda Corey (1999). Comparing th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Attitudes in the Virginia 30000 Study of Twins and

- Their Relatives. *Twin Research and Human Genetics*, 2 (2), 62 – 80.
- Fraga, Mario, Esteban Ballestar, Maria Paz, Santiago Ropero, Fernando Setien, Maria Ballestar, Damia Heine-Suner, Juan Cigudosa, Miguel Urioste, Javier Benitez, Manuel Boix-Chornet, Abel Sanchez-Aguilera, Charlotte Ling, Emma Carlsson, Pernille Poulsen, Allan Vaag, Zarko Stephan, Tim Spector, Yue-Zhong Wu, Christoph Plass & Manel Esteller (2005). Epigenetic Differences Arise during the Lifetime of Monozygotic Twi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2 (30), 10604 – 10609.
- Gauly, Britta (2017).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Attitudes: Analyzing Time Preferences and Reciprocity.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38 (2), 293 – 312.
- Ge, Xiaojia, Rand Conger, Remi Cadoret, Jenae Neiderhiser, William Yates, Edward Troughton & Mark Stewart (1996). The Developmental Interface between Nature and Nurture: A Mutual Influence Model of Child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Parent Behavio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 (4), 574 – 589.
- Glaeser, Edward, David Laibson, José Scheinkman & Christine Soutter (2000). Measuring Trus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 (3), 811 – 846.
- Golley, Jane & Sherry Tao Kong (2013). Inequal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1 (2), 15 – 37.
- Gong, HONGE, Andrew Leigh & Xin Meng (2012).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58 (3), 481 – 503.
- Gong, Jie, Yi Lu & Huihua Xie (2015). Adolescent Environment and Noncognitive Skills.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97046.
- Grönqvist, Erik, Björn Öckert & Jonas Vlachos (2017).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2 (4), 887 – 918.
- Harris, Judith (1995). Where is the Child's Environment? A Group Socialization Theory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 (3), 458 – 489.
- Heckman, James, Jora Stixrud & Sergio Urzua (2006).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and Noncognitive Abilities on Labor Market Outcomes and 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4 (3), 411 – 482.
- Kim, Phillip & Howard Aldrich (2005).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Foundations and Trends in Entrepreneurship*, 1 (2), 55 – 104.
- Kling, Jeffrey, Jeffrey Liebman & Lawrence Katz (2007).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 Neighborhood Effects. *Econometrica*, 75 (1), 83 – 119.
- Kosfeld, Michael, Markus Heinrichs, Paul Zak, Urs Fischbacher & Ernst Fehr (2005). Oxytocin Increases Trust in Humans. *Nature*, 435, 673 – 676.
- Manski, Charles (2000). Economic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3), 115 – 136.
- Rotter, Julian (1966).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80 (1), 1 – 28.
- Zhang, Yingqiang & Tor Eriksson (201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Nine Chinese Provinces, 1989 – 2006.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 (4), 607 – 616.
- Zumbuehl, Maria, Thomas Dohmen & Gerard Pfann (2018).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Economic Preferences and Attitudes. *Swiss Leading House Working Paper*, No. 148.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Evidence on Locus of Control and Trust

Ao Xiang, Chen Xuan & Zhao Zhong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in 2010 and 2012,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within Chinese families. We focus on two important personality traits: locus of control and trust. This study finds direct transmission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independent effect of prevailing traits i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n children; and transmission of locus of control to children through parents' positive assortative mating based on personality traits. The result certifies that the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culture applies to the context of China. In addition, variou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two traits, which suggests that soci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The results are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esign policies that may influence personality traits of children.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ersonality traits, assortative mating, locus of control, trust

JEL Classification: D1, J12, J13, J62

(责任编辑：王永浩)